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 2011J013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编号 JB-ZR1124）、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编号 2009KB12）共同资助

闽南近代建筑

陈志宏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福建省自然科学基金 (编号 2011J01316)、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 (编号 JB-ZR1124)、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 (编号 2009KB12) 共同资助

闽南近代建筑

陈志宏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闽南近代建筑 / 陈志宏 著. —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112-14866-0

I. ①闽… II. ①陈… III. ①建筑史 — 研究 — 福建省 — 近代 IV. ①TU-092.5

本书对闽南近代建筑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研究, 主要内容有: 闽南地域传统与近代侨乡社会; 城市近代化与侨乡建筑发展; 闽南近代洋楼民居; 闽南近代骑楼建筑; 嘉庚建筑的地域性“民族形式”。结语部分总结了闽南近代地域性建筑发展给广大建筑工作者的启示。

本书可供建筑历史方向的研究人员、高校教师、博士及硕士研究生等学习参考, 也可供对闽南侨乡近代建筑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欣赏。

责任编辑: 陈 桦 许顺法

责任设计: 董建平

责任校对: 陈晶晶 王雪竹

闽南近代建筑

陈志宏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京点设计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89×1194 毫米 1/20 印张: 13 1/2 字数: 427 千字

2012 年 12 月第一版 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ISBN 978-7-112-14866-0

(22893)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前言

侯幼彬在《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主题：现代转型》中认为：“近代中国的建筑转型，基本上沿着两个途径发展：一是外来移植，即输入、引进国外同类型建筑；二是本土演进，即从传统旧有类型基础上改造、演变。”对于这种“本土演进”的近代建筑，虽然不是现代转型的主渠道，但建造的数量极大，主要是与普通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业建筑和居住建筑。这些由地方工匠主导的民间建筑同样受到外来影响，也发生与传统建筑不同的近代演变，“正是这种大数量的、扎根于地域实际的本土演进式建筑，构成了中国近代的新乡土建筑。这方面的转型规律也是我们应予认真研究的。”^[1]

在近代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随着西方传教士和建筑师将“西洋式”建筑引入中国，新古典主义、折中主义以及外廊样式等充斥着近代中国的大多数商埠城市。“西洋式”建筑的盛行引起了中国近代建筑师对城市与建筑西化、本土建筑传承的忧虑，触发对民族建筑“传统复兴”的高度责任感。受到外国建筑师在“中国式”教会建筑（也包括学校、医院等）的启发，以南京中山陵、广州中山纪念堂、“首都计划”等政府项目为标志，中国建筑师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掀起了对“中国固有形式”广泛探索的建筑思潮。与中国建筑师对外来建筑进行“民族化”探索不同，民间建筑的“本土演进”则更多的依托于地域实际，大量地采用地方的材料工艺，并满足传统的民俗习惯，大胆地融合了外来的结构技术与装饰样式。例如，在居住方面体现出对地域传统民居空间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延续与变异；在商业建筑方面则大多以传统店屋空间形式加上洋化的门面……

刘先觉在《如何继续进行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中提出“中国近代建筑史应该充分反映中国传统民居如何向现代住宅过渡的历史”^[2]，及时地对近代居住建筑进行调研与整理，既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也对现实的设计具有参考价值。以石库门里弄民居为代表的近代民间建筑一直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探讨的重要课题，有关的著述、论文不断地问世，如王绍周、陈志敏编的《里弄建筑》，罗小未、伍江主编的《上海弄堂》，以及沈华主编的《上海里弄民居》等，对里弄民居形成与发展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地论述。另外，杨秉德在《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中更将石库门里弄民居作为“早期西方建筑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影响

[1]侯幼彬.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主题：现代转型.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6

[2]刘先觉.如何继续进行中国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张复合主编.中国近代建筑研究与保护（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15

的三条渠道”之一的“民间传播渠道”的典型代表，并且认为“民间传播渠道涉及范围很广，如广东、福建的侨乡建筑就是极有价值的研究课题”^[1]。

由于近代侨乡是以侨汇经济为依托，大量的归国华侨在侨乡投资建房、兴办侨资学校和社会公益事业，除了洋楼和商住合一的骑楼建筑属于近代民居类型外，大量的商业性建筑与侨资学校等并不能归于民居研究的范畴，可以说，闽南侨乡近代建筑的“本土演进”并不局限于居住建筑上。这些侨乡近代建筑在设计手法与技术工艺上，沟通了中西建筑文化交融的多样化渠道，促进了传统地域建筑的近代延续与发展，显示了传统建筑文化对外来影响的吸收与融会能力，其独特的历史价值无疑是不可忽视的。

罗志田在《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中认为：近代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多歧性，“幅员广阔造成了明显的区域性发展差异，同时还存在着社会变动与思想（或心态）等具体面相的发展变化速度不同步的现象”。^[2]反映在建筑方面，正如杨秉德认为的，1840年以后的中国近代建筑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部分：“新建筑体系的产生、发展与旧建筑体系的延续、变化”^[3]，虽然新建筑主要建造在为数不多的大城市，数量也相对较少，但所代表的新建筑体系产生与发展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主流与方向，同样也是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当然，在当前建筑全球化以及文化趋同等问题得到广泛关注时，建筑理论研究以及建筑创作中提出“批判地域主义”、“全球——地区建筑”、“当代乡土”、“高技乡土”等多元建筑发展的应对策略，重新来审视与研究这些近代民间自觉性、非主流化的地域性建筑探索方式，对于当前建筑发展中对“传统与现代”、“国际性与地域性”、“延续与发展”等方面的思考无疑是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除了作为当前地域性建筑发展的近代先期探索的历史意义外，研究闽南近代建筑更是因为侨乡与华侨在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流中的特殊性。曹树基是这样论述移民与文化交流的关系：“不同人群创造的文化存在差异，不同地域的文化风貌也不尽相同。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移。”^[4]历史上移民在促进中外以及地域间文化交流与共同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近代时期海外移民更是中外文化融合中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据统计，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一百年间，中国人口国际迁移人数多达1000万人，其中大多数是从广东、福建迁移到东南亚各地，也有一部分迁至欧美各国^[5]，数量庞大的华侨群体不仅是带动近代中国文化在海外的广泛传播，随着华侨在侨居地的定居，更引发了不同文化间的多元融合与共同发展。

中外建筑文化交流与融合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盖自太古以来，早吸收外来

[1]杨秉德.中国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史.高介华主编.中国建筑文化研究文库.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128-129

[2]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26

[3]杨秉德.中国近代建筑史分期问题研究.建筑学报,1998,第9期:54

[4]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586

[5]丘立本.国际人口迁移与华侨华人研究.郝时远主编.海外华人研究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41

民族之文化结晶……试观汉以后之来自匈奴西域者，魏晋以后之来自佛教者，唐以后之来自波斯大食者，元明以后之来自南洋者，明季以后之来自远西者”，朱启钤的这段讲演对中外建筑交流史进行了简单概述，也说明了外来建筑文化对于推动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到了近代，随着中国国势日趋衰微，中外建筑文化交流更多地表现出外来文化单向的传播与影响。与近代西方殖民者强制输入、中国留学生主动学习等由外向内的单向传播途径不同，华侨在侨居地和侨乡两边的建筑活动体现了近代中外建筑文化双向交流的一面。华侨一方面将原乡的建筑形式移植到侨居地，形成了一些如“唐人街”等华人聚居区域，并与侨居地的地方建筑相结合，也融合了西式的做法，出现了很多类似于“Sino-Malay Palladian house”^[1]的一种混杂了英属印度殖民地外廊、马来亚高脚楼和中国式屋顶等多元折中式建筑；另一方面，华侨返回祖国后，又将各自侨居地建筑类型引入到侨乡，再次与当地传统建筑相结合。背井离乡、远赴海外的华侨大多出身贫寒，又基本上没有受过建筑教育，其建筑活动大多凭借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经验，因而在近代建筑文化交流与融合中深深地打上乡土性的烙印，展现出与近代中外建筑师设计作品不同的特点。

《中国建筑史》教科书中对于中国城市的近代转型认为：“既发轫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侵入，也受到本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驱动；既有被动开放的外力刺激，也有社会变革的内力推进，是诸多因素的合力作用。”^[2]如果说，近代西方建筑的被动输入以及中国建筑师的主动学习，奠定了中国现代建筑发展的重要基础的话，那么，近代侨乡的建筑活动则可以说是合力推动中国建筑文化革故更新浪潮的涓涓细流。侨乡建筑表现出与近代主流发展方向亲密相关，但又有相对独立的发展历程，更由于体现了近代中外建筑交流中双向传播的特点而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在当前，侨乡近代建筑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而成为近代中西建筑文化交融与发展研究中的重要缺环，开展侨乡近代地域性建筑的系统研究，可以带动有关中国近代建筑发展中民间性“本土演进”的广泛深入的研究，从而弥补以往研究的缺憾，共同推动中国近代建筑研究系统的更加完善，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 David G. Kohl,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Western Malaya: Temples, Kongsis and Houses, Hong Kong: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ASIA)LTD, 1984: 70*

[2] 潘谷西主编. *中国建筑史* 第四版.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1: 305

目 录

前言

第 1 章 闽南地域传统与近代侨乡社会	1
1.1 地域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	1
1.1.1 地理条件.....	1
1.1.2 气候条件.....	3
1.1.3 历史沿革.....	4
1.1.4 文化特点.....	5
1.2 近代闽南侨乡的形成.....	7
1.2.1 海外移民的发展.....	7
1.2.2 闽南侨乡的分布.....	9
1.2.3 侨汇经济的影响.....	10
1.2.4 侨汇的投资方式.....	11
本章小结.....	13
第 2 章 城市近代化与侨乡建筑发展	15
2.1 近代厦门租界的建设.....	15
2.1.1 厦门口岸的开埠.....	15
2.1.2 殖民建筑的引入.....	16
2.1.3 建筑的管理制度.....	20
2.2 闽南近代城市建设进程.....	22
2.2.1 近代城市建设的开启.....	22
2.2.2 闽南近代城市建设.....	23
2.3 从城市改造到新区拓展.....	30
2.3.1 以旧城改造为主导.....	30
2.3.2 厦门城市建设的转向.....	36
2.4 近代建筑营造体系的初步建立.....	41
2.4.1 建筑技术法规管理.....	41

2.4.2 建筑设计与建筑师.....	42
2.4.3 建筑营造业的发展.....	45
2.5 近代地域性建筑的形成与发展.....	47
2.5.1 早期的侨建大厝.....	47
2.5.2 早期的华侨洋楼.....	49
2.5.3 主要的建筑类型.....	52
本章小结.....	53
第3章 闽南近代洋楼民居	55
3.1 闽南洋楼的类型特征.....	55
3.1.1 鼓浪屿华侨洋楼.....	56
3.1.2 侨乡独立式洋楼.....	63
3.1.3 大厝合院中的洋楼.....	70
3.2 洋楼与侨乡社会生活的变迁.....	77
3.2.1 家族伦理关系.....	78
3.2.2 日常生活方式.....	79
3.2.3 社会治安状况.....	83
3.2.4 地方风水观念.....	88
3.3 洋楼的群体布局关系.....	90
3.3.1 乡族聚落的洋楼配置.....	90
3.3.2 城市洋楼的群体布局.....	99
3.3.3 洋楼花园的布局方式.....	103
3.4 闽南洋楼的设计与施工.....	111
3.4.1 民居营建方式的发展.....	111
3.4.2 洋楼设计图纸的研究.....	116
本章小结.....	121
第4章 闽南近代骑楼建筑	123
4.1 闽南骑楼的形成与发展.....	123
4.1.1 骑楼的建筑概念.....	123
4.1.2 城镇街屋改造方式.....	125
4.1.3 闽南骑楼的建设过程.....	129
4.1.4 闽南山区的木骑楼.....	134
4.2 闽南骑楼的单体特征.....	138
4.2.1 单体空间构成.....	138

4.2.2	商业布局特点.....	143
4.2.3	立面样式演变.....	147
4.2.4	闽南红砖骑楼.....	152
4.3	闽南骑楼的群体关系.....	156
4.3.1	街道群体布局.....	156
4.3.2	街道外部空间.....	164
4.4	闽南近代骑楼的保护与发展.....	169
4.4.1	闽南骑楼的保护与改造.....	169
4.4.2	对闽南骑楼发展的展望.....	173
	本章小结.....	178
第5章	嘉庚建筑的地域性“民族形式”	181
5.1	陈嘉庚与嘉庚建筑.....	181
5.1.1	陈嘉庚的办学经历.....	181
5.1.2	嘉庚建筑的历史分期.....	184
5.1.3	嘉庚建筑的发展概况.....	186
5.2	地域性“民族形式”的早期探索.....	194
5.2.1	福建教会大学“中国化”建筑.....	194
5.2.2	嘉庚建筑早期地域化探索方式.....	200
5.2.3	对近代闽南地方建筑的影响.....	205
5.2.4	近代建筑思潮在闽南的传播.....	208
5.3	地域性“民族形式”的后期发展.....	212
5.3.1	地方材料工艺的成熟运用.....	213
5.3.2	建筑师与工匠的共同参与.....	215
5.3.3	单体形式的后期探索方式.....	220
5.3.4	群体关系的后期探索方式.....	225
5.4	地域性“民族形式”的形成因素.....	228
5.4.1	科学性与民族性.....	228
5.4.2	大传统与小传统.....	230
5.4.3	地域经验与经济实用.....	232
	本章小结.....	234
	结语（闽南近代地域性建筑发展的启示）	235
	附：图表目录	240
	参考文献	253
	后记	259

第1章 闽南地域传统与近代侨乡社会

1.1 地域自然环境与历史发展

1.1.1 地理条件

闽南厦门、漳州、泉州三地位于福建沿海地区的南部，被称为“闽南金三角”地区。从区位关系上看，东北与莆田市、福州市交界，西北与龙岩市、三明市接壤，西面为福建省界与广东省梅州市、潮州市毗邻，东临台湾海峡，与台湾省隔海相望。(图 1-1) 从地貌形态分区上看，属于闽东南沿海丘陵平原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部有“闽中屋脊”之称的戴云山脉，再往北是福建多山地区，向西通过水陆交通到达广东，东南面是台湾海峡，海岸线蜿蜒曲折，有许多半岛突出，水深浪平，形成许多天然良港，如以“古刺桐港”闻名中外的泉州港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图 1-2)。^[1] 福建省内的闽江、木兰溪、晋江和九龙江等河口均有较宽阔的平原发育，形成福建四大平原，其中漳州平原是闽东南沿海丘陵平原区中最大的平原，面积达 850 平方公里，其次为福州平原、兴化平原，最小是泉州平原，面积仅 345 平方公里。

在整体地形上，闽南地区为南北的狭长形，正好形成南北两片的不同口音，北片分布在晋江流域，而南片在

[1]泉州宋元时期的古刺桐港，是由一系列支港构成的港口群，位于泉州湾、深沪湾及围头湾的海岸线上，有十二处支港分布其间，素有“三湾十二港”之称。泉州湾内有洛阳、后渚、法石及蚶江四支港，深沪湾有祥芝、永宁、深沪及福全四支港，围头湾内则是安海、金井、围头及石井等四处支港，其中以后渚港最大，也最是著名。参见庄为玘《古刺桐港·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50-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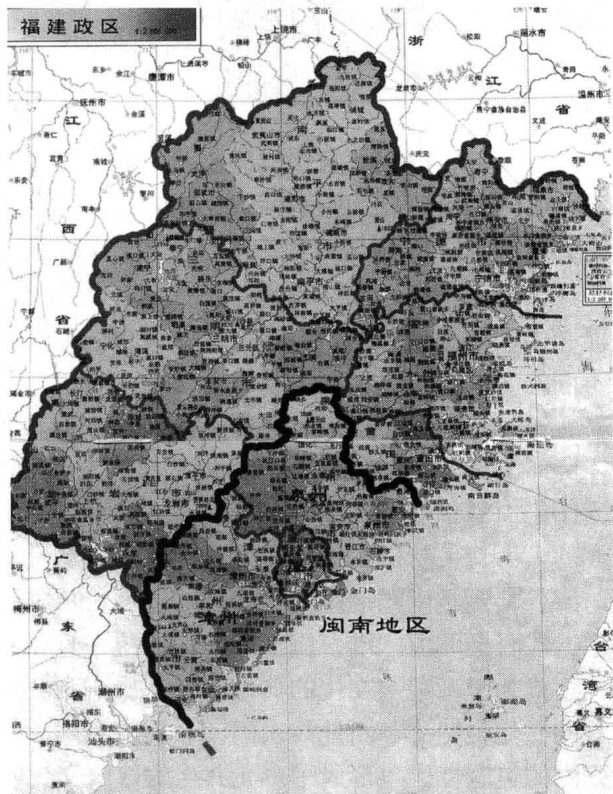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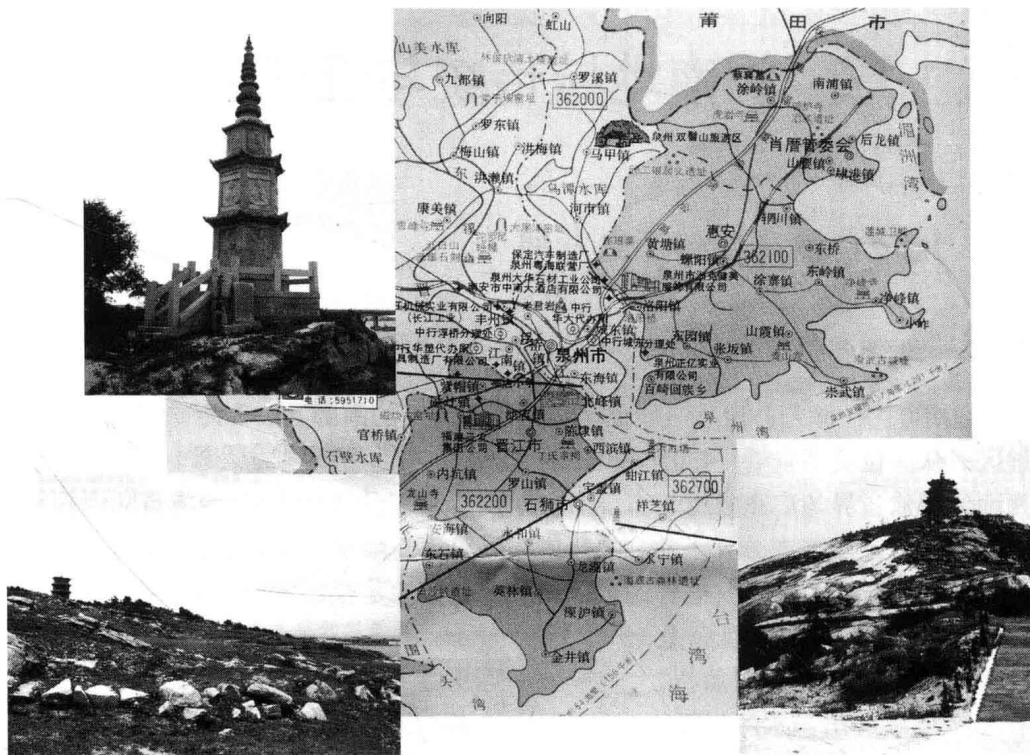


图 1-1 福建省政区地图(粗线内为闽南地区)

图 1-2 泉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航标塔（上图为江上塔、左下图为金钗山六胜塔、下右图为宝盖山万寿塔）



九龙江流域，以明清泉州、漳州两府城方言为两种代表口音，厦门方言则在后来集南北片的特点成为闽南话的代表方言。南北片区的邻近交通关系也促成了不同的邻域交流，漳州与岭南的潮汕交流密切，泉州与邻近的莆仙、福州互通频繁，山区则与闽西有较大的融合。在建筑方面，泉州与漳州的传统民居之间略有不同，而闽南山区土楼与闽西客家土楼相似相近却又各具特色，不同片区的建筑特色与不同的邻域影响有密切关系。

在对外交通上，福建自古陆上交通一向不便，有“闽道更比蜀道难”之说，阻隔了与中原内陆地区的联系。^[1]与陆上交通不便相对照的是海上交通的发达，闽南沿海城镇处于河海运的交汇点，漳州城在九龙江下游，泉州城在晋江与洛阳江的入海口。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闽南较不易受来自中原地区的直接影响，反而能与海外特别是南洋地区发生较强的联系。从宋元的泉州港到明代漳州月港，到后来近代时期的厦门港，海上贸易的传统一直在闽南持续不断地延续与发展，海洋文化成为闽南地域文化的典型特征，影响到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海外文化与邻域的文化也源源不断地渗入闽南，汇流到闽南的区域文化之中，构成了闽南文化强烈的包容性，也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建筑文化特色。

[1]古代福建的陆上交通以官方的驿路为主，到清代，由邻省进入闽南的主要是从广东大路入闽，逾分水关，过诏安、漳浦、漳州、泉州，而后北上抵省会福州，除了这条道路较为平坦外，其余都是“崇山狭流”，“羊肠小道，盘纤陡峻”的艰难险道。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系编（赵昭炳主编）.福建省地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230

1.1.2 气候条件

闽南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其气候条件可以与福建其他地方作一比较。

气温：年平均气温明显高于西、北部，冬季气温较高大多在 11℃ 以上，夏季气温全省各地差异很小（图 1-3）。

降水：闽南沿海地区都较少，年雨量约 1100 毫米左右，而省内山区则达 2000 毫米（图 1-4）。

日照：年日照时数 2100 ~ 2400 小时，比省内北部、山区多。

台风：是全国受台风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8 ~ 9 月是台风影响的高潮期，如果正面袭击，常出现 10 级以上大风伴随暴雨，是闽南地区主要的气象灾害。

闽南地区的气候是温暖湿润的，以泉州为例，唐诗云“四序有花长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故泉州又被称为“温陵”。夏季炎热、潮湿气候成为影响建筑的主要因素，民居中小天井与开敞厅堂以利于遮阳与通风。另外，沿海多台风与山区多雨水的不同特点，民居在建筑构造上也有不同的方式适应相应的气候条件，如“硬山式可防台风侵袭，在沿海民居较多见；悬山便于挡雨，内地山区民居较多采用。”^[1] 闽南特定的地理气候环境影响了乡土聚落的空间脉络与民居建筑的地域特色，同时也是其近代以至今后地域性建筑发展所遵循的重要因素。

[1]张千秋等主编.泉州民居.福州:海风出版社,1996:128



图 1-3 福建省年平均气温 (°C) (粗线内为闽南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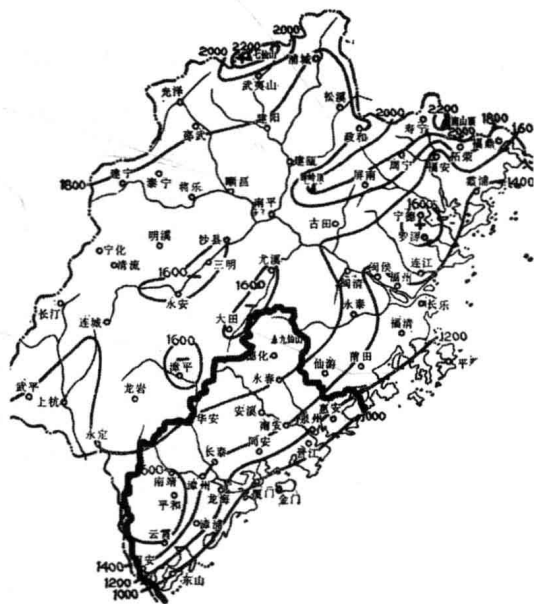


图 1-4 福建省年降水量 (毫米) (粗线内为闽南地区)

1.1.3 历史沿革

闽南最早开发的地区应数泉州的晋江流域，东晋时已有不少北方汉人迁入泉州，南北朝时已有相当程度的开发。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改郡为县，隶属泉州（治所在今之福州），泉州之名始见于此。唐嗣圣元年（公元684年）置武荣州，景云二年（公元711年）武荣州改称泉州，此乃泉州单独建制之始。漳州的九龙江流域是闽南得到进一步开发的地区。在唐高宗、武后时漳州还遍布蛮獠，总章二年（669年）“獠蛮啸聚”，民族矛盾尖锐，陈政率岭南军前往平叛，陈政死后，其子元光领众征剿，平息叛乱，且耕且守于云霄、西宁之所。垂拱二年（686年），在泉、潮二州之间设置一州，将泉州分出一部分置漳州诸邑，此为泉州与漳州分治之始。自南朝陈至唐中叶的200多年间，晋江、木兰溪和九龙江流域设置了二州七县。

从唐垂拱二年泉州与漳州分治后，相互间又有两次大的辖地调整，一次是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析泉州龙溪县改隶漳州；一次是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泉州长泰县析出归入漳州。这可见泉州与漳州之间密切的历史渊源，实际上，在历史上的很长一定时期，闽南（厦、漳、泉三地）的大部分是作为一个整体隶属于历史上的泉州。泉州、漳州自建州以后，沿革多变，管辖地域不一。但泉州的治所至今不变，都在现今的泉州市鲤城区；而漳州的治所则有较大变动，唐垂拱二年（686年）建州时，州署设于西林，唐开元四年（716年）迁州治于李澳川（今漳浦县城绥安镇），唐贞元二年（786年）迁至龙溪县登高山南麓桂林村（今漳州芩城区），两次迁移相隔正好100年。

据史书记载，厦门“为漳郡之咽喉”、“泉郡之名区，海滨之要地”。厦门岛原是泉州府同安县辖地，大历年间厦门地名称为“新城”。到了北宋时期岛上已有众多村落，称为同安县嘉禾里，隶属于绥德乡。明朝初年为抗击倭寇的侵扰，驻闽南永宁卫的中、左二所设在厦门，故有“中左所”之称，公元1656年郑成功改厦门为“思明州”。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在厦门设立海关，正式开放为对外贸易港口，从此，厦门成为福建的军事、政治、经济重镇。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成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辛亥革命后设厦门道，1912年成立思明县。1935年4月正式成立厦门市政府，厦门成为福建省第一个市，比省会福州设市早11年。

泉州现行政区划辖地包括鲤城、丰泽、洛江与泉港四区，晋江、石狮和南安三市，以及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和金门（待回归）五县。漳州共辖八县一市二区，即华安、长泰、漳浦、云霄、东山、诏安、南靖、平和八县，龙海市，及

漳州市中心的芗城区与龙文区。厦门市现辖思明、海沧、湖里、集美、同安、翔安六个区。

1.1.4 文化特点

闽南区域文化的发展,从整体上看,其核心是中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从区域来看,受其特定的地理环境的熏陶与外来文化的影响,经过交流、碰撞、融合,形成自己的个性和特质。

1) 边缘形态

战国时代,越王勾践后裔入闽,建立闽越国,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播下闽越文化。三国时期,孙权经略江南,建立建安郡,曾经组织五次入闽,在南安设置东安县,把管辖范围一直延伸到濒海地区。西晋末年,北方诸少数民族南下中原,战乱频繁,“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中州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1]由于大量晋人南迁,沿江而居,晋江便因此而得名。唐代又有两次大规模入闽,唐初的陈元光和唐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都带来了大批汉人,福建区域内南下的汉人就越来越多,逐渐地居于社会的主要地位。大批汉人入闽,带来中原的先进技术和先进文化,与闽越文化相互碰撞、融合,中原文化逐渐成为这个地区的主流文化。

从历史上看,文化的边缘地区大多具有多元文化相互共存、融合的特点,闽南文化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延伸性与边缘形态的变异性。一方面,随同移民携带并成为闽南社会发展主导的儒家文化的正统性,也使闽南文化在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规约中,具有了崇儒与守成的一面;但同时,吸收了先民某些文化基因而带有原生性的成分,迥异于奠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这种边缘化的异质性形成了闽南文化性格自由、开放的另外一面。随着持续不断的海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异质性的文化因素的不断融入,包容或涵化在儒家文化之中,使传播入闽南的中原文化呈现出某些边缘形态的殊异色彩。

2) 多元兼容

费孝通先生曾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理论,认为中华文明在历经数千年而更加茁壮,是因为能长期不断地兼容并纳不同文化的特点,并提倡“美人之美”、“各类其美”的观念,用以形容中华文明兼纳不同的文化,能欣赏接受多元文化的心胸气概。^[2]闽南文化在长期海外贸易的文化冲突与交流中形成的海洋文化正是这种兼容并蓄传统中较为突出的例证。从唐代以来,不同时期的外来文化持续不断地注入闽南的多元文化之中,特别是后来的海外移民浪潮,漳泉华侨遍布东南亚,对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影响更为深远,可以说是对异

[1]黄仲昭修纂.八闽通志(弘治)卷86.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1018

[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1~95

[1]“备极壮丽的印度教寺的建立,也在很大程度上象征着印度人在刺桐港的积极姿态与经济实力。甚至连犹太人都可能建有他们宗教活动的场所”,被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引自王连茂.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概述.蔡耀平,张明等主编.学术泉州.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54

[2]一直到清末,进士林骚以白狗庙其名不雅,乃改名为“白耆庙”,耆字是高寿之意,取其音同但所祀不变。吴幼雄.泉州宗教文化.厦门:鹭江出版社,1993:311

[3]明代万历时在福建为官的江南人王世懋对比了福建内地与沿海的这种差异:“闽西诸郡人皆食山为足,为举子业不求甚工。漳泉海隅,其人以业主为不贲,以肌海为恒产,故文则扬葩而吐藻,几三吴:武则轻生而健斗,雄于东南夷,无事不令人畏也”。引自庄国土.闽南人文精神的特质和局限.中共泉州市委宣传部编.闽南文化研究.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323

[4]宋代泉州人著作不完全统计有412集2200多卷,明代约1100余部,清代800多部,足证泉州文化积淀之深厚,被称为“八闽名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傅金星.泉贤著作述评.厦门:鹭江出版社,1994:2~5

质文化更主动的吸纳与融合。

外来文化对闽南的影响,以泉州体现得最为突出,在宋元时期泉州的摩尼教,以及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景教)和天主教的方济各派、婆罗门教、犹太教等都有较大的影响。据史载:到元时,泉州已有六七座伊斯兰教寺院、三座天主教堂、多座景教和印度教寺院。^[1]随着宋元海上贸易的发展,泉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外侨社会,元人庄弥邵曾叹曰:“一城要地,盛莫于南关,四海舶商、诸番琛贾,皆是乎集”,城南在宋元时期是外国侨民的聚居地,“诸蕃有黑白二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

在泉州城北的白耆庙,主祀一只尖嘴大白狗,后殿则附祀真武帝、文昌帝君,据吴幼雄先生考证,此白耆庙具有印度教湿婆教派神庙的遗风。^[2]这种将印度教的狗神与民间传统信仰中的神祇同祀的现象,正是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的独特体现。闽南人在长期的海外贸易中接触不同文化时,能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同时也经常能容忍、接受不同的文化习俗,甚至能够欣赏与吸收,并巧妙地与自身文化很自然地结合。在传统以及近代民居中都表现出多元文化共存的特点,特别是在民居装饰上经常都表现出不同文化特征的糅合之美。

3) 商业文化

严酷的自然环境,移民的生存意识,孕育了闽南文化的务实精神,崇尚商业的传统。民以海为田,赁海为市,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传统儒家文化的“鄙视商贾”也并不居于支配地位,社会环境表现出对商业的宽容。道光《晋江县志》将商贾与农工并列,而非置于四民之末,“行货曰商,居货曰贾,商贾之名,虽亚乎士,而与农工,均在四民之列”^[3],闽南传统社会价值观明显表现出“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与孟子所推崇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同,泉州人李光缙在《景壁集》中主张儒者为贾以求其志,“士君子不居朝廷,必游市肆,此非羞贫贱而厌仁义,良亦欲有所行其志焉”。相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儒家信条,闽南人更重事功实利,具有强烈的务实逐利的社会风气。

另外,闽南社会中重商逐利的异质因素被包容或涵化在儒家正统文化之中,表现出极其鲜明的儒商并重,亦儒亦商的特质。宋代刘克庄有诗云:“唯有刺桐南廓外,朝为原宪暮陶朱”,原宪是孔子的学生,而陶朱是商人的始祖范蠡,体现出商儒结合的双重性。这种儒商并重的社会风尚,使闽南海上贸易“梯航万国,此其都会,殆为东南巨镇”的同时,又被称为“海滨邹鲁”的文化之乡。^[4]“泉州城大于福(省会福州),北背洛阳江,南面晋江,倚泉山而城”,经济与文化的兴盛也形成了闽南人自古以来对区域文化的自强与自尊意识。

1.2 近代闽南侨乡的形成

1.2.1 海外移民的发展

据史籍记载,闽南人因经商出国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明清时期虽有海禁的闭关政策,仍有大量的闽南人出洋谋生或侨居海外,“商贩者至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到 17 世纪“以泉籍人为主导的海外华商网络已基业稳固,在欧人对东南亚的贸易和开发热潮中与闽南海外移民互动,其经贸和移民范围从东南亚沿海扩展到内陆,也带动了其他籍群(如客家、广府)的海外移民”(图 1-5)。^[1]

但是出国人数最多的时期是鸦片战争之后,华侨作为廉价劳工(契约劳工)大量地被诱拐到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而以南洋各殖民地的华工最多、最为集中,此为近代华侨出国的第一次高峰期。到 20 世纪 20 ~ 40 年代,世界市场对热带资源如橡胶、锡的需求量急,使东南亚经济出现了短暂的景气,尤其以种植园、矿山需要大量劳动力。华南沿海诸省华侨出国人数迅速增长,这一时期为第二次出国高峰期。

以泉州近代华侨在印度尼西亚的发展为例,17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以前,泉州籍华侨多数从事小商贩、手工业,部分人从事农耕(图 1-6);其后,有人开



图 1-5 英国海峡殖民地新加坡、檳城、马六甲发给华侨的“登岸准证”

[1]庄国土.海贸与移民互动:17-18世纪闽南人移民海外原因分析.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1(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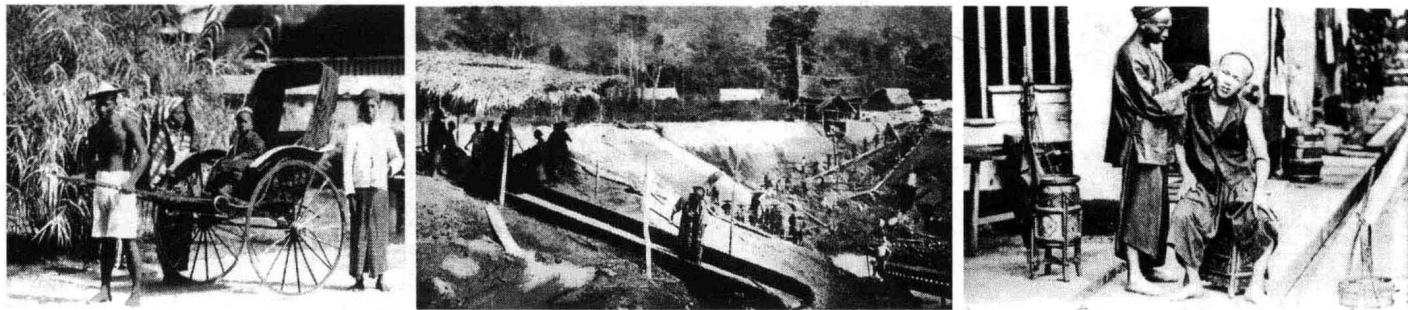


图 1-6 早期南洋华工主要职业:人力车工、锡矿工、剃头匠

[1]引自泉州鲤城区政府侨台之窗网站:
http://www.qzlc.gov.cn

[2]李亦园.一个移植的市镇:马来亚华人市镇生活的调查研究.台北:正中书局,民国74(1985):79-83

始经营小规模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厂(坊)。此后,荷兰殖民者推行种植园经济,华侨纷纷将土地卖给荷印公司,成为商品推销和土产收购的中介、零售商。20世纪初,泉州籍华侨中开始涌现出稍具财力的中产者,以旅居泗水的泉州江南树兜蒋氏家族最具实力,经营20多家咖啡、蔗糖、大米等土产购销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泉州籍华侨经济迅速发展,至20年代出现不少资本较雄厚的华侨企业家(图1-7)。^[1]

华侨在海外寄人篱下,往往与籍贯相同的乡亲聚居在一起以求生存。在东南亚各国均有大量的华人社团组织,从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对马来亚麻坡华人社会的社团组织调查中可以看到,华人社团有的是地方性及方言性社团,如福建会馆、漳泉公会、惠安会馆等;有的是宗亲会,如陈氏宗亲会、蔡氏济阳公所等;还有职业公会等等。^[2]这些华人社团对内保持团结,接济乡里;对外力求一致,以适应复杂的环境。华侨在侨居地事业有成后,往往率引亲朋一同前往侨居海外,把南洋变成第二故乡。

马来西亚槟城龙山堂邱公司是东南亚华侨姓氏宗祠组织最有代表的,不仅宗族庞大,迄今还延续近650年相当程度的宗族体系。槟城龙山堂源自漳州海澄县三



图1-7 1922年祖籍泉州的印尼华侨黄奕住创办的中南银行(The China & South Sea Bank)天津分行